

非遗文化的当代活化与振兴路径研究

——以滑县木板年画为例

杨媛媛 王志浩 王别格 易伍

安阳工学院 土建与交通工程学院 河南 安阳 455000

【摘要】：本文以滑县木板年画为研究对象，结合其当下传承与传播现状，探讨其文化价值、现实困境及活化利用路径。滑县木板年画不仅承载着鲜明的地方民俗记忆，也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和社会文化传播意义。但在现代社会生活方式变化的背景下，其传统使用场景不断缩减，传承主体后继乏力，既有生产方式与当代传播需求之间也存在一定脱节。针对这些问题，文章从文化内涵转换、视觉形式提炼和传播媒介更新三个方面展开分析，提出通过当代表达重构年画意义、通过图形语言提炼增强设计转化能力，并借助数字化手段拓展其传播与应用空间，以推动滑县木板年画在当代语境中的延续与发展。

【关键词】：滑县木板年画；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代转译；活化传承；数字化传播

DOI:10.12417/2705-1358.26.06.001

近年来，年画类非遗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发生深层迁移：春节张贴习俗弱化、消费审美更迭与媒介结构转向叠加，使传统年画面临“年画与年俗在当代变得难以融合”的现实张力^[1]。与此同时，年画凭借强识别的图像程式、吉祥如意与地方记忆，仍不断被召回为可再阐释、再设计、再传播的文化资源。围绕这种变化，木版年画“其意义的转换是不可避免的”，关键在于如何“重构为生产者、消费者和文化精英所共享的、整体性的新意义”，从而重新建立人与遗产对象之间的关系^[2]。滑县木板年画作为豫北民间美术的重要形态，其图像母题、套色工艺与礼俗语义原本嵌入家庭空间与节庆秩序；当其进入文旅消费、公共文化与数字传播场域时，更需要把分散于单件作品与经验传承中的信息整理为可被理解、可被使用、可被持续生产的知识与符号体系，使传统图像在新的使用场景中形成稳定的传播链路与认知接口，并为后续的设计转译与数字化活态传承奠定可验证的基础。因此，有必要从文化内涵、表现形式和传播方式相互关联的角度出发，对滑县木板年画在当代社会中的转化路径进行梳理。这不仅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年画类非遗在时代变化中的意义延展，也有助于推动地方民间美术在当代生活中的延续与表达。

1 滑县木板年画的非遗文化价值

滑县木板年画生成于豫北乡村的节庆礼俗与家庭空间秩序之中，其价值首先体现为一种可被持续识读的“地方性表

述”：图像母题、套色工艺与张贴实践共同构成乡土生活的视觉语法，而非脱离场景的审美对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续一般是建构在地方性表述之上的，其文化的核心与根脉仍在地方性的话语表述当中”^[3]。据此观之，门神、童子等程式化形象及其吉祥如意，并不是被动陈列的符号，而是在反复使用中，将祈愿、伦理与家庭关系嵌入空间装饰与节俭秩序，使年画成为“看得见、用得上、记得住”的文化记忆载体；这种可延续的符号体系，也为后续的视觉提炼与设计转译提供了稳定的语汇基础。

在审美表达与社会功能层面，滑县木板年画还体现出由“使用图像”向“公共文化资源”转化的潜能。对称饱满的构图方式、重彩设色与象征性造型，使其在不同历史阶段保持了较高的形式稳定性；与此同时，年画的意义并非由单一创作者赋予，而是在生产、流通与使用的过程中不断被社会成员确认，这种机制在对民间艺人与地方社会关系的讨论中被反复呈现^[4]。当年画从节俗必需品逐渐进入展示、传播与创意应用场域，其价值评价也随之与传承主体、传播空间及资源配置发生关联。非遗的关键“核心是传承文化的人”，并记录“每逢春节前夕……家家户户都有张贴年画的习俗”^[5]：这类生活性传播网络说明，年画天然具备公共参与与文化空间生成的条件。将滑县木板年画置于“生产—使用—传播”的循环中理解，其文化价值并非外在“附加”，而是在持续被感知、被认同与被再生产的过程中不断得到确认。

作者简介：杨媛媛（1989—），女，汉族，河南汝南人，硕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建筑设计及其理论。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024-ZDJH-830)。

2 滑县木板年画在当代语境下面临的现状与问题

滑县木板年画原本依托节庆时序与家庭空间的使用逻辑得以延续，但当张贴习俗弱化、居住环境与审美趣味更迭后，年画从“生活必需”转向“文化对象”的过程明显加速：作品仍可被观看与消费，支撑其稳定再生产的日常需求却在收缩，传动力随之发生结构性变化。与此相伴的是技艺学习门槛与收益预期之间的张力被放大——在年画类木版技艺的师徒传承叙述中，“学艺也不是谋生的唯一、必需手段”的观念变化，直接影响青年进入与长期投入的可能性^[6]。对滑县而言，这种变化不仅意味着“买不买年画”，更意味着工艺链条、知识结构与地方生活之间的连接正在变松，导致年画文化难以继续以原有方式嵌入日常秩序。

供给侧的组织问题进一步放大了这种不确定性。年画生产并不只是一件作品的完成，而是刻版、套色、材料准备、销售与传播等多环节协同的结果；一旦传承队伍断层或管理与市场环节跟不上，便容易出现“能做的人少、能卖的路径窄、能持续的机制弱”的连锁效应。桃花坞年画的现代转型经验中，“断代严重、缺少中坚力量的支撑”这一描述，揭示了年画类非遗在当代普遍面临的人才结构脆弱问题^[7]。对应到滑县木板年画的现实语境，即便局部场景出现展陈、体验或短期活动，若缺乏稳定的传承梯队与与之匹配的运营组织，生产端就难以形成可持续供给，进而影响后续的产品化、空间化与数字化转化深度。

传播与应用层面的矛盾同样突出。年画进入文旅消费、公共文化服务与平台传播后，往往被要求“易理解、易使用、易扩散”，但传统年画的意义系统与工艺逻辑并不天然适配这种传播结构：一方面，象征语义若脱离礼俗语境，容易被简化为装饰符号；另一方面，工艺知识若无法以现代媒介语言被清晰表达，也容易在传播端被“结果化”呈现，留下图像而失去技艺与文化解释。国家级非遗佛山木版年画的保护论述中提到“父子相传、师傅带徒弟的传承模式逐渐式微”，提示年画类非遗在传播端面临的并非单一“曝光不足”，而是与传承方式、生产组织、受众理解之间的系统失配^[8]。对滑县木板年画而言，这一失配会具体表现为：符号可见度提高却难以沉淀为稳定认知；体验活动能带来短期触达却难以形成持续学习与再生产；线上传播可扩展半径却可能进一步弱化其与地方生活的内在关联。因而，现状问题的关键并不止于“如何推广”，而在于如何重建年画在当代生活、生产与传播系统中的位置与机制。

3 滑县木板年画的当代转译策略

滑县木板年画进入当代公共文化与多媒介传播场域后，“转译”的核心不在于把传统图像搬运到新载体上，而在于让年画原有的意义逻辑继续可被理解、可被体验、可被认同。基

于年画与节俗共同体之间的历史关联，当代转译需要同时处理“符号为何成立”“情感如何抵达”“叙事怎样被共享”等问题，使年画从节庆仪式中的视觉物，转化为仍能承载祝愿、关系与地方记忆的文化表达^[9]。

3.1 意义转译：从民俗符号到当代文化语义

3.1.1 从仪式性意义到情感性表达

年画在传统社会中的有效性，首先来自它与节庆仪式、家庭空间、祝愿伦理之间的紧密耦合：张贴行为不是单纯装饰，而是把“护佑—纳福—教化”等观念固定在可见的图像秩序中。意义转译的首要任务，是保留这种“祝愿逻辑”的结构稳定性，同时把它从特定仪式场景中释放出来，转入当代日常可感的情感关系之中。门神、童子、鱼纹等母题之所以能够穿越代际流通，关键在于它们把抽象期许转成具体形象——如年画通过“将抽象概念转化为具象事物”来实现象征表达与大众识读的对接。在当代语境下，转译并不需要削弱其象征性，而应把象征指向与当代生活经验重新绑定：将“辟邪纳福”转译为“安全感与家庭守护”，将“多子多福”转译为“亲情延续与代际祝愿”，将“丰收发财”转译为“生活秩序与努力回报”等价值语义，使受众无需依赖外部说明即可在观看中完成理解^[10]。这样，年画意义不再只依附春节张贴这一单一仪式，而是在礼赠、家居陈设、公共节庆视觉等多重使用情境里持续生成情感回应，形成可延展的当代语义谱系。

3.1.2 从地方经验到可共鸣叙事

年画的地方性并不等同于地域封闭，相反，它常以“可复制的叙事模板”将地方生活经验组织为可共享的祝福表达：人物—场景—吉语的组合方式，为受众提供了快速进入意义的路径。当代转译可以延续这种叙事组织能力，把“地方经验”转化为“可共鸣的叙事单元”：一方面，围绕年画母题提炼出稳定的故事骨架（如守护、团圆、丰收、节庆往来），使其能够在不同媒介形态中保持叙事一致性；另一方面，通过对人物关系、节俗行为与生活场景的重构，让受众在叙事中获得可代入的情感位置，而不是把年画仅当作“地方符号”的展示对象。融媒环境下年画传播之所以仍具活力，正在于它能承载“求吉祈利的精神寄托”并适应新的分享机制：祝福从家庭空间扩展到社交传播，叙事从单幅张贴转为多端触达。对滑县木板年画而言，意义转译可沿着“母题—情境—关系”的路径推进：以母题维持文化识别，以情境重建理解通道，以关系（家庭、邻里、同辈互赠）承接情感流动，使地方经验在被讲述、被使用、被分享的过程中自然获得跨地域的共鸣能力，从而把“地方的年画”转化为“可被共同阅读的年画”。

3.2 形式转译：从传统图像到设计语言

意义要在当代被稳定理解，必须通过“可被设计使用”的形式进入具体媒介与生活情境。滑县木板年画的形式转译，并非把传统画面简化为装饰图案，而是将图像中最具辨识度的纹样、构图与色彩关系转化为可编辑、可复用、可组合的设计语言：既保留木版线刻与套色所形成的审美张力，又能适配不同尺度、材质与传播界面，并在持续应用中积累稳定的视觉识别与文化记忆。

3.2.1 纹样、构图与色彩的设计化整理

形式转译的关键，在于把“作品性图像”转换为“规则化资源”。纹样整理不止是图形提取，更应建立可检索、可调用的类型体系：以母题（门神、童子、瑞兽、花卉、器物等）与构成方式（对称/中心式/满构等）为索引，配合线条特征、结构骨架、寓意标签与适用场景，形成层级清晰、边界明确的纹样资源库。色彩整理同样需要从经验性走向可复现：木版年画的套色习惯与高纯度对比，是其视觉识别的重要来源，但跨媒介应用时若缺少标准支撑，易出现色相漂移与风格断裂。相关讨论已指出，用色常“多根据手艺人的主观经验而定，缺乏用色标准”，并提出借助色度测量与编谱建立“色彩参考系统”，进而“构建…色彩数据库，实现用色标准化”^[11]。

在此基础上，构图语言的整理更应强调“结构—节奏—密度”的可迁移表达：将传统画面中边饰、角花、纹样带与主体形象的层级关系转写为版式规则（边界控制、留白策略、视觉重心与导视路径），使年画的“满而不乱、密中有序”不依赖单件画面的原样复制，而能在海报、包装、导视与数字界面等载体中维持一致的风格逻辑。

3.2.2 从完整画面到可组合视觉单元

年画图像进入当代设计系统，往往需要在“整体性呈现”与“场景化适配”之间取得平衡。完整年画常包含多母题、多层次与多色套印，直接搬用容易造成信息拥挤或语义失真；将其拆解为“轮廓线单元—纹样单元—色彩单元—组合模板”，既能保存传统形态的典型性，也为跨产品、跨平台的组合提供稳定接口。相关研究在元素提取层面提出，可对典型作品“进行视觉符号元素的提取工作”，并对传统色彩“进行纯度、明度及亮度的调和”，以适配当代品牌视觉与用户偏好^[12]。

对滑县木板年画而言，“可组合”并不意味着“越碎越好”，更重要的是组合后仍能保持可识别的“年画语气”。一方面，优先保留承载风格的骨架性特征（线刻粗细、形体比例、套色块面关系），避免只剩题材符号而失去形式张力；另一方面，通过组合规则约束变体边界，降低过度流行化处理带来的风格稀释风险。文创策略讨论亦提到，年画题材与造型因“造型繁

杂”而出现“难以整理、难以解构、难以模块化”的现实问题，并给出“纹样特征分析-参数化逻辑建构-图元参数化+纹样结构参数化-参数化纹样特征提取”的提取思路^[11]。这种“结构化拆解—规则化组合”的路径，使滑县木板年画能够从单件作品的审美呈现，转向面向多场景的设计供给，为后续媒介转译与数字传播奠定可持续调用的形式基础。

3.3 媒介转译：从实体传播到数字活态

滑县木板年画进入数字媒介环境后，传播不再等同于“把图像搬上屏幕”，而是一次传播关系与文化经验的再组织：一端是以资源采集、规范著录与结构化存储为支撑的长期留存，另一端是以互动、分享与再创作作为特征的参与式流通。年画的图像体系、象征语义与工艺经验，只有在被系统记录并形成可检索、可比对、可追溯的知识结构之后，才可能在不同媒介与不同受众之间保持同一套解释基准；同时，数字平台的内容竞争与注意力机制又要求年画以更可感、可用、可参与的方式进入公共文化场域，使传统图像从“展览对象”转化为可被使用的文化表达工具。由此，媒介转译的关键在于把“资料化的稳定性”与“传播中的可参与性”并置：前者确保年画文化要素不在数字化过程中被割裂、被误读，后者确保年画不因数字呈现而停留在静态展示层面，而能在当代生活中持续被感知、被理解并被再生产。

3.3.1 数字化整理作为活态传承的基础条件

数字化整理的重点并非“保存了多少张图片”，而在于能否把年画作为“技艺—图像—语境”的整体对象进行结构化留存。滑县木板年画的版样、套色谱系、母题组合、题材寓意与张贴情境彼此关联，任何单一维度的留存都会削弱其整体可解释性。相应地，数字化整理应面向“可调用”的学术与应用需求：在高精度图像采集的基础上，同步补入版片信息、色彩标注、母题分类、构图关系、用途场景、制作过程记录与传承人口述资料等元数据，使分散于单件作品中的视觉与工艺信息转化为具有内在逻辑的文化资源库。这样形成的系统档案，既能支撑学术研究 with 教育展示，也能为后续设计转译提供稳定的源数据与语义锚点，避免在再设计、数字展示与传播应用中出现“只剩符号、不见结构”的空转。更重要的是，结构化留存使年画从依赖经验延续的传承方式，转向可被反复调取、再解读与再使用的形态：同一母题在不同版本中的差异、同一套色逻辑在不同工序中的变化、同一寓意系统在不同语境中的接受路径，都能够被持续记录与回溯，从而为后续的“意义重构”与“形式转译”提供可核对的依据。

3.3.2 数字媒介中的参与式传播路径

数字媒介并不天然带来“活态”，活态往往发生在受众能够进入、能够表达、能够再生产的传播机制之中。滑县木板年

画在数字平台的传播,应以“可参与”作为核心指标:一方面,围绕节庆情绪与日常使用场景组织内容,使年画不只作为“被观看的传统”,而成为可被使用的当代表达;另一方面,通过轻量互动与社群化分享,让受众在生成、转发、评论与再创作中形成对母题与吉祥语义的主动理解。在具体实施层面,可将滑县木板年画的当代传播内容划分为三种类型,并建立相互衔接的表达机制。第一类是以工艺展示和知识传递为主的说明型内容,主要借助短视频、直播及图文解析等形式,对刻版、施墨、套印等核心工序进行分步骤呈现,以增强公众对其制作过程和文化内涵的理解。第二类是以日常使用和情感传达为主的生活型内容,可将门神、童子、鱼莲等典型母题转化为适用于节庆问候、社交传播和家庭陈设的视觉资源,使其文化寓意在具体使用过程中逐步被感知和接受。第三类是以用户互动和再创作为主的参与型内容,例如数字涂色、拼图叙事、表情符号、数字贴纸以及线上主题活动等,通过参与式机制提升受众对年画图像结构、象征意义及表现方式的理解与再表达能力。传播结构上,应建立“传承人—设计/数字创作者—受众”的协作关

系,保证图像更新与文化解释同步推进,避免仅凭流量逻辑导致符号化消费;传播闭环上,把线上互动与线下体验衔接起来,例如以节庆节点、地方展陈与研学活动为触发点,通过数字平台沉淀用户内容与传播数据,使参与不止停留在一次性围观,而能形成可持续的社群记忆与再传播动力。

4 结语

滑县木板年画的当代延续,不应局限于技艺保存和样式再现,而应在文化内涵、视觉表达和传播方式的持续调整中,重新融入当代生活。本文结合其由节俗图像向公共文化资源转化的现实过程,提出应从意义表达、视觉梳理和传播参与三个层面推动其活化利用,进而增强其在现实场景中的使用可能与社会可见度。今后的研究可进一步加强年画资源的系统整理与版本研究,完善传承人、设计者、平台与地方场域之间的协作机制,并推动数字传播与地方节庆、空间展示、研学教育等实践结合。如此,滑县木板年画的当代转化或可由个案探索逐步发展为具有推广价值的实践路径。

参考文献:

- [1] 邵高娣.春节的视觉记忆与文化变迁——以传统年画的多重发展维度为中心[J].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2025(1).
- [2] 田阡.从“意义混乱”到“意义重构”——从1949年来木版年画的发展看“非遗”生产性保护中的意义转换[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0(2).
- [3] 荣树云.“非遗”语境中民间艺人社会身份的构建与认同——以山东潍坊年画艺人为例[J].
- [4] 朱伟.现代语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达与叙事[J].文化遗产,2021(1).
- [5] 谢春.非遗传承人的传播实践与文化空间再造——以绵竹年画为例[J].现代传播,2021(9).
- [6] 周伟.绵竹木版年画的师徒传承[J].四川戏剧,2019.
- [7] 吕原,张宗建.“非遗”语境下桃花坞年画保护传承的运营模式与现代转型[J].文化艺术研究,第12卷.
- [8] 许结玲.国家级非遗佛山木版年画的现状、传承与保护[J].
- [9] 周韧,李鑫澜.朱仙镇木版年画传统文化内涵与当代审美困境探析[J].传承,2021(04).
- [10] 袁宙飞.融媒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意衍生与传播——以年画为例[J].民俗研究,2021(3).
- [11] 房庆丽,苏军强.民俗文化视域下武强年画文创产品设计策略[J].家具与室内装饰,2025,32(08):120-124.
- [12] 何媛媛,陈俊宇.基于用户偏好的朱仙镇木版年画品牌形象设计[J].包装工程,2025,46(20):329-338.